

# 迁家离乡，房玄龄的乡愁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曹淑贤

## 成龙寻祖“一波三折”

“前有盛世宰相，后有华人榜样……”这是在今天房氏家族中流传甚广的一句话，前一句说的是唐朝开国丞相房玄龄，而后一句则指当今的香港影视巨星成龙大哥。

很少有人了解，原名陈港生的成龙会有房姓的祖先，而且还是祖籍山东的房玄龄？

成龙之父本名房道龙，成龙母亲陈月荣是房道龙第二任妻子，1954年他们生下陈港生，陈港生从艺后取艺名成龙。

2013年9月2日，成龙从上海赶到安徽芜湖认祖归宗，并在裕溪口街道同父异母的大哥房仕德家中逗留了十几分钟。

此前，成龙多次表示，自己是从山东迁居安徽的房氏家族后人。2004年，他甚至把刚出道的儿子改回了“房”姓，而“房祖名”三个字更有纪念祖先的意味。

2014年5月16日的上午，在房玄龄父亲房彦谦位于济南历城区彩石镇的墓地旁，当地做石材和旧货生意的徐明忠笑着回忆，前几年，一向冷清的房墓突然稀稀拉拉来了很多人，据说是成龙的儿子房祖名来寻祖。

徐明忠的说法难找旁证，不过，在一场名为《走进齐都》的演唱会上，房祖名的确曾经高兴地对淄博观众说：“这里是我的老家。”

对此，立刻有房氏后人出来提出异议：是不是成龙认错了祖宗，找乱了祖籍？

彩石当地的村民老徐也听祖上人讲，即便成龙的祖宗确实姓房，也是房姓的武将房仁裕，而不是房玄龄这支。

这一说法得到了房家后人、济南市考古专家房道国的证实，“说成龙就是房玄龄的后裔，现在依然缺少族谱上的连续证据。”

不过，隋末大将房仁裕与房玄龄其实同祖。按照“天下房氏，望出清河”的说法，唐以来的大部分房氏后人确有可能都是“清河”一家。

相传，房氏出自祁姓，舜封尧子丹朱于房，以国为氏。王莽末，房氏先祖之一的房雅任清河郡太守（今济南周边），于是家族相传的房家便聚居于清河，直到房玄龄时，一直家居于齐州济南。此后却因房玄龄后人房遗爱改变而家道衰落，族系离散。

史料记载却误导了不少人，史书称房玄龄为“齐州临淄人”，意即“齐州临淄郡人”，然而此临淄（今山东淄博）却并非临淄郡，因此今天房玄龄常常被人想当然地以为是临淄城人。而由于后代族谱出现断代，扬州、芜湖以及南方多地的房氏后人可能都有着共同的房氏祖先。

## “乡举里选”兴房氏

曾有媒体推断，成龙寻历史名人为祖先，不仅是寻根，还希望给自己的身世加分。

不过，成龙找寻祖先的心情现在或许有了更流行的解释，“让城市融入大自然，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。今年3月份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中的这句话，让人再次关注自己最初来的那个地方。

如今，在彩石一个几亩地方圆的小院里，每年总有多则百人，少则数十人的房氏后人在房玄龄父亲隋朝监察御史房彦谦墓前祭拜。房道国说，那时才感到身在家族当中，共望一个祖先的家族凝聚感。可惜在今天的中国社会，想找寻到真正的祖宗，就连成龙这样的社会名流找起来也实属不易。

房道国还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山东房氏联谊会主要发起人。想到如今散居海内外的房氏后人，房道国说，谁也不会想到房氏曾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六十个大家族之一。

在齐州房氏研究者、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尚兵的考证中，定居清河数代的房氏家族一直定居于乡里之间，而非城市。家族不仅有着大田生产、园圃种植、林木种植、饲养、采集、蚕织和酿造等方面的庄园经济，而且还世代研习经学，服膺儒教，培养德才兼备的家族人才，在“乡举里选”中获得提名而成为地方长官。

甚至在这个大家族中，不仅孩子可以共同习传经学，还可以通过做官的亲戚直接作为实习生在官场行走，房玄龄的女儿便曾随父亲一同断案。不过，在历史学家眼中，乡土中国时代却有着不同的解读。

周尚兵说，西汉流传下来的选官制度，让社会上的精英必须植根于乡里。

“从西汉一直到隋唐，那时的官员选拔不是依靠考试而是靠乡里推选，推选的裁判

权一方面在乡官手中，一方面也在于被推举者个人的品性。特别是乡官在推荐本乡人才为吏时需要考察两个方面：一是家境富裕，二是修有善行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乡里子弟想要出人头地，仅靠自己奋斗是不够的，还要依靠家族和乡里的合力。

不过，特殊的官员选拔在当时中国官民社会产生这样一个逻辑：于乡里积累声誉入仕为官，为官后在家族财产的支持下又以廉洁自奉，进一步获得良誉而能长久为官，而长久为官得到的利益更多，进而形成地域与家族的良性发展。

于是，虽然政治和文化精英在任职地有家，但为了获得长久的个人和家族利益，其家庭仍居留于乡里，其俸禄和资源也回流入乡，中央与地方、城市与农村都保持着经济与文化的平衡。

今天新农村建设中被专家诟病的“千乡一面”，在过去的中国乡里社会却是“地丑德齐”的另一番状态。

“那时社会精英们的‘家’、‘乡’是在一起的，也就是‘家乡’这个词的来源。”周尚兵说，乡里文化的发达，主要在于社会人才选拔的评判权留在了地方，也就把先进的文化与土地紧紧相依。

不过，按照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，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时期是中国的中古时代，或称中世纪。欧洲在中世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，在那时的中国也有类似的“贵族”。

虽然乡土文化、草根文化、地域文化伴随着这些聚居乡里的“贵族”沿袭发展，但在平民与仕途之间，地方“贵族”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制度“鸿沟”：“自隋、唐而上，官有簿状，家有谱系。官之选举，必由于簿状；家之婚姻，必由于谱系。”

“平民没有经济实力，没有家族熟人的乡官举荐，在那个时代，平民阶层的子弟想入仕为官，是没有机会的。”周尚兵说，这不仅成为社会发展的一道障碍，同时也注定让国家政权无法集中。

## 学而优则入居城市

在动荡年代，一个大家族仅仅依靠推举族人入朝做官还无法实现家族的长期繁荣。从魏晋南北朝期间，房氏家族先后经历了南燕、东晋以及北魏王朝，作为始终被统治的一股政治力量，家族势力屡屡受到中央政权抑制，房氏家族也只能“丘园自养”。

周尚兵考证，为了让家族长久繁荣下去，房氏家族不仅教习子弟文治与武略，而且还将其安插在不同的政治力量当中，降低政治风险。

“人们常说，是房玄龄的政治眼光选择了李唐。实际上，当时房家的三个子弟房仁裕、房玄龄和房山基是分别投靠了王世充、李渊和瓦岗寨李密这三个政治集团。”周尚兵说，此后房仁裕以及瓦岗集团转投李唐，房玄龄从中就利用了家族的各种关系。

李唐政权建立后，房玄龄为代表的房氏一族也走向鼎盛。不过，“良相”房玄龄却没有坚持过去的让家族发展赖以继的乡举里选，更终结了功臣的世袭制度。

贞观三年，唐太宗与杜如

晦商谈选官标准事宜曾因“功臣行世封事”而止。对于“功臣行世封事”，由于“非久安之道”，房玄龄持明确的反对态度，因此与长孙无忌联名上表反对世袭刺史。而明确不同意“割地以封功臣”的房玄龄，也自然会反对当初以几个家族势力治理地方的传统做法。

此后，唐代官员的选拔不复为“乡举里选”，实际是选举用人权从地方大族的手中收归中央。

对于祖先的选择，房道国觉得，地方家族势力过大，影响着政权的统一和社会公平，“就像在现在一些村庄的基层选举中，村主任往往也是从家族人数较多的当中选出，这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政治风险。”房道国说。



隋监察御史房彦谦墓碑。

但周尚兵说，由于科举制的制度设计目标不再指向地方，相比于汉魏时代，家族子弟如果不经科举便不再有仕途上升空间，平民精英阶层则可以通过个人努力，而非乡里推荐获得成功。甚至在唐朝后期，一张试卷的成绩便已替代过去在乡里的德行考评。

于是，乡村过去的精英阶层通过科举把家从乡移到了城里，“学而优则仕”同时也成为“学而优则入居城市”。而由于个人奋斗不再来带乡里恩情，从唐代开始，官员、士族及地主的各种收入也不再“反哺”乡村，相反的，农村的文化精英、资金流向城市，导致农村文化、经济基础日渐弱化，中国社会运转结构就此改变，延续至今。

那时期的房氏也在经历房玄龄儿子谋反案后，悄然衰落。即使此后有房瑄等中唐丞相级别人物出现于家族中，但过去聚居乡里的齐州房氏，已逐渐离散，选择“不仕则农”作为治生途径，多数散居务农，或经营家族剩余的庄园经济。

房氏家族的乡里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。周尚兵发现，齐州房氏后人的墓志铭表明，他们的居住地与墓莹田产是城乡分离的，当年聚居于乡里的房氏已然彻底瓦解。

当研究者再次来到今济南历城区彩石镇时，除了先祖的墓碑，当地已不见了房氏后人的影子。唯有中华房氏网上的一个个名家头像，还能让人们将这个大家族中每个人联系到一起。

或许房玄龄也未想到，一个巩固中央集权的人才选拔制度，已然将1000年以后的中国城乡与家族的面貌，彻底改变了。



山东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联合报道

当人们早已习惯背起背包，把家庭从农村迁往城市，不再守乡聚居时，历史与考古研究者房道国仍在怀念曾经植根乡土的家族文化，并纠结于祖先们的选择。

1000多年前，因家族势力起家，并辅佐李世民成就盛唐江山的相房玄龄，在那个时代悄然“革”掉了自己家族的发展之“命”，用科举制替代乡举里选。

这让曾经“地丑德齐”的中国家族社会走向个体，乡土中国开始迈向城镇，同时也打破了许多地方家族家风家学甚至繁衍生息的规则。

不过，当今天又一轮农村劳动力与知识精英向城市集中时，曾经依靠家族势力实现社会治理的千年房氏家族，是否仍然有些值得人们回味的往事？

▼位于济南市历城区彩石镇的房玄龄父亲房彦谦之墓。

